

《佛教大藏經史 八——十世紀》評介

汪 娟

《佛教大藏經史(八——十世紀)》 方廣錫 著

32開本 518 頁 37萬字 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1991 年 3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印數三千冊
ISBN 7-5004-0918-4/B·191 定價：大陸人民幣 9 元

本書是方廣錫先生以其博士論文《八——十世紀的中國漢文寫本大藏經》(1988.8)為基礎，再予修定增補而成。另有英譯本，由北京師範大學客座教授彌維禮博士譯為英文。

書前有任繼愈先生序、英譯本自序，書末附有《吐蕃統治時期敦煌龍興寺藏經目錄》[頁356-392]、敦煌遺書伯3010號錄文[頁393-414]、《開元錄·入藏錄》復原擬目[頁415-510]、主要參考書目[頁511-513] 等四個附錄及後跋[頁514-518]。

正文部分以〈漢文寫本大藏經史略(代導言)〉[頁1-10]為首，說明了大藏經的含義及最早出處，並將寫本大藏經的發展分為四個時期：第一蘊釀時期——從佛教初傳至晉·道安撰《綜理眾經目錄》時止，第二形成時期——從鳩摩羅什來華至隋·費長房撰《歷代三寶紀》時止，第三結構體系化時期——從《歷代三寶紀》編成至唐·智昇撰《開元釋教錄》時止，第四全國統一化時期——從《開元錄》撰成至北宋刊刻《開寶藏》時止；此後則由刻本大藏經取代寫本大藏經成為最主要的流通本。本書的研究重點在於第四時期，但也包含了第二、三時期的一些內容。

次分四章，茲分別敘述如下：

第一章 《開元錄》對漢文大藏經結構的貢獻[頁11-43]

本章首先介紹智昇的生平資料及其所撰《開元錄》的結構內容，其次透過歷代經錄的比較分析，評述漢文大藏經結構的演化與得失以及《開元錄》在這方面的貢獻與不足。

第二章 從《開元錄》到「會昌廢佛」的漢文大藏經[頁43-217]

本章分別從皇家官藏、敦煌地區藏經和其他地區藏經等三方面來考察自《開元錄》到「會昌廢佛」時的漢文大藏經。皇家官藏一節主要論述：一、《開

元錄》以前皇家造藏的情形及其規範各地藏經的作用。二、《開元錄》雖被敕入官藏，但至會昌廢佛之前仍未真正成為皇家官藏的目錄。三、開元以後，皇家干預官藏的組成和內容，已逐漸形成一種慣例。敦煌地區藏經一節，是以吐蕃統治時期的龍興寺大藏為主要研究對象，利用大量的敦煌寫本為材料，以它們和歷代經錄進行比對後得知：敦煌諸寺係以龍興寺為佛典的貯存與流通中心，而龍興寺的大藏所依據的入藏錄則是以《內典錄·入藏錄》為基礎改編而成的，寺藏中同時存有一大批未經著錄的典籍。其他地區藏經一節是由功德思想——佛教俗信化的角度和各宗派對藏經的不同態度來探討藏經的流傳情形，有三個重點：一、圍繞大藏經的宗教活動，包括讀經轉藏、抄經造藏與供養藏經。二、大藏經的表現型態，包括正藏、別藏、天台教典、毗尼藏、禪藏、以部分（或一部）經典代藏、個人文集附入藏等。三、有關西土及唐國藏經的傳說。

第三章 「會昌廢佛」後的漢文大藏經[頁217-273]

本章論述「會昌廢佛」時對佛典的嚴重損壞，造成了正藏以外各種型態的藏經的亡佚或衰微；廢佛後各地重造大藏，使得我國的漢文大藏經從晚唐到五代曾經過一段百花齊放的歷程，才逐漸統一到《開元錄·入藏錄》上來。而敦煌遺書中保存了五代時以《開元錄·入藏錄》為基礎的《沙州乞經狀》，除了顯示曾有帝王御賜藏經給沙州外，沙州僧眾曾到中原尋覓經本的此一活動，也和全國的大藏經歸於統一的活動相一致。

第四章 漢文大藏經帙號考[頁274-355]

本章主要考證寫本大藏經的外部標誌與貯藏方式，首先否定了傳統以為千字文帙號為智昇所創的說法，利用文獻資料與實物的相互印證，重新追溯由經名標誌法、經名帙號法、定格存貯法、敦煌地區特有的偈頌帙號法，以至產生千字文帙號的必然發展過程。作者認為千字文帙號產生於晚唐，到五代時已在全國流行。由於千字文帙號使得大藏經裡的典籍有了固定的編次，大藏經的型態相對穩定下來，是全國藏經能夠真正歸於統一的重要原因之一。

本書作者利用歷代典籍、敦煌寫本和金石方面的豐富材料，運用文獻學的方法，做了嚴謹詳實的考證，為中國漢文寫本大藏經史建立了一個相當完整的架構，其重要貢獻可以歸納成以下兩點：

一、彌補佛教大藏經史研究的空白

本書以八——十世紀的佛教大藏經史為研究重點，包含歷代經錄的流傳演變和結構分析，皇家官藏和地方寺廟藏經的情況等等，更致力於敦煌地區藏經的管理與流通等方面研究；許多材料和觀點都是發前人所未發，彌足珍貴。至於其重要創見，可參見以上各章的介紹，茲不一一贅述。

二、敦煌文獻的整理研究

殘卷的綴合，是處理敦煌文獻的一個重要基本工作，作者在這方面也取得了一些成績。例如：頁118 指出「伯4741號是一塊小殘片，僅三行，但恰可補

綴於伯4664號的右下角上，故兩號實爲一件。」另外，作者對有關佛典目錄的寫本做出校錄，也有助於後人的繼續研究，以下就部分比較完整的錄文，列出敦煌寫本卷號與本書起頁對照表，提供讀者參考：

斯2079號 頁356	斯5594號 頁234	伯3807號 頁356
斯2140號 頁254	伯3010號 頁393	伯3851號 頁256
斯3565號 頁195	伯3202號 頁131	伯3852號 頁125
斯4640號 頁253	伯3313號 頁345	伯4962號 頁135

此外，作者基於前賢的研究成果，亦頗多訂正前賢舊說，例如頁299，王重民將伯3010號寫本定名爲「三界寺歷年新寫藏經目錄」，作者則定爲「某寺歷代配補藏經錄」，因爲寫本云：「戊子年五月十七夕(日)三界寺借將《四分律》陸帙并錦帙寫去記」，可見是三界寺向該寺借經記錄。

當然本書也不是十全十美的，在某些枝節的問題上仍有待商榷，以下試就管見所及，提出一點小意見。

一、組織方面

本書的〈漢文寫本大藏經史略(代導言)〉是從佛教藏經發展的分期直接帶領讀者進入正文，除此之外別無「緒論」事先說明作者對於材料的掌握及方法的運用，可能增加不少讀者閱讀上的困難。因爲作者沈浸於原始材料多年，信手拈來，自然是駕輕就熟，不覺困難；但是讀者對於某號敦煌寫本係何內容，不先有一大概認知，緊緊追隨在作者的考證文字之後則是相當吃力的。此外，本書正文四章之後，沒有「結論」一章來總結作者的創獲，略嫌美中不足。

至於章節方面也有可議之處，例如：第二章的第二節裡又分七項，第一項說明考察時限，第七項爲小結，其餘五項爲本節正文：第二項討論伯3432號龍興寺供養佛經歷與《內典錄·入藏錄》的關係，第三項討論龍興寺的地位及佛藏管理，第四項討論敦煌諸寺藏經與《內典錄》的關係，第五項也是討論龍興寺的藏經目錄，第六項則討論龍興寺大錄內的無名典籍。其中的二、五、六項均以龍興寺藏爲中心，似應隸於第三項之後，而第四項泛論敦煌諸寺，當置於本節正文之末。如果重新組織本節各項順序爲一、三、二、五、六、四、七，可能更具條理。

二、內容方面

內容有待補充之處：雖然本書運用了大量敦煌寫本的資料，但作者於此仍有遺漏。例如：《敦煌劫餘錄續編》(頁69上)所載0329號〈見一切入藏經目錄〉，係三界寺比丘道真於長興五年(934)見當寺藏內經論部帙不足，發願尋訪古壞經文所寫；斯6225號亦題有「三界寺比丘道真諸方求覓諸經隨得雜經錄記」；斯3624號首題「三界寺見一切入藏經目錄」【註一】等等，這些寫本的內容均未見作者述及。王重民則曾提出「敦煌佛經上面有一部份打著三界寺的藏書印記，說明在最後的一段時期，即張氏、曹氏統治時期，敦煌的佛教寺院圖書館以三界寺爲最大。」【註二】這一類以三界寺爲敦煌最大的寺院圖書館的

推論，也不見作者提及或加以評論。三界寺與龍興寺的藏經規模在敦煌寺院中所處的地位究竟如何，彼此之間有何關係，應該是一項值得深入探討的課題，實在不宜偏廢。

文字有前後矛盾之處：例如頁119-120 中言敦煌遺書中屬於全國性的佛經目錄至今只發現了十九號（不包括列寧格勒所藏）。其中以《內典錄》最多，共八號。但於頁141-143 卻只列出《眾經別錄》存有兩號、《內典錄》存有五號、《大周錄》(?)存有一號、《開元錄》存有五號（其中一號為列寧格勒所藏）、《貞元錄》存有一號。不僅對《內典錄》的敘述前後不一，全部的總數亦不相符。

敘述不夠週延之處：例如頁303 倒數第 5行云：「與經名標誌法相比，經名帙號法優點主要有兩條：第一，更簡煉，從而使用也更方便。第二，如前所述，經名標誌法已產生與帙號內容脫節的現象。而經名帙號則更無法反映帙內佛典的內容。」上述第二條帙號不能反映內容，其實應屬經名帙號法的一個缺點，作者卻將之列為優點。

又如：頁314 第17行言〈無常偈〉的「後20個字，絕大部分都不重複，也具備作帙號的條件」，事實上「如來證涅槃，永斷於生死，如能至心聽，常得無量樂」這二十個字，除了「如」字兩見，「永斷於生死」的「生」字，和前半偈中「是生滅法」的「生」字重複，而「常得無量樂」的「常」字也和「諸行無常」的「常」字重複，（「樂」字和「寂滅為樂」的「樂」字重複不論，因為作者已指出「生滅滅已，寂滅為樂」重複字太多，不適於用作帙號。）至少已有三字重複，實難謂之「絕大部分都不重複」。

同頁倒數第 2行「如第六個帙號為『生』，出於『是生滅法』，第52個帙號又是『生』，重複了。為此，伯3010號的作者第六個帙號『生』旁加注了一個『先』，是否意味著作者認為應把這個『生』改作『先』呢？」在此提供另一種看法：即「生」旁加注「先」字，未必是指將「生」改作「先」，也可能是利用「先」字來標示此一「生」字帙號是指前面的一帙，以與後面的「生」帙相區別，若此則「先」字並非帙號，用以表示先後而已。此說如能成立，將有助於解決將「生」改作「先」所產生字句不通的問題。

三、行文方面

作者於行文時，有時會先提出問題的雙面假設，但在多方考證問題時，又一一否定原來的假設，直到最後下結論時，又比較贊成某一假設。令人覺得似乎跟著作者團團跑之後，又回到了原來的地方。例如：頁321 討論偈頌帙號「實際地位」的一段文字，便提出「是伯3010號的作者在接受、清點已配補好的藏經時，為了方便，一時心血來潮，順手創制、隨後就廢棄了的一種帙號呢？還是當時確實存在一套長達幾百字的偈頌帙號，並實際運用於敦煌的佛經管理呢？」的問題。對於問題的考證，作者先將伯3010號按照偈頌將帙號重新排列，發現這部藏經諸經的先後次序與各經錄均不相符，且在該號寫本還有一部經

是用經名標誌法，似乎說明偈頌帙號法只是在配補藏經時臨時創用、隨後就廢棄的工作法。接著否定此一看法，因為該號寫本上的帙號並未完全按順序著錄，推論這種帙號在相當的範圍內被一批人使用。……而且這種帙號前後跨過六個年頭，似乎證明偈頌帙號法曾實際用於敦煌某寺的經典管理；但此一說法又無法解釋「法」、「生」等帙號重複的問題。最後作者認為現在還無法得出明確的結論，但傾向於「這種帙號大約僅用於配補藏經活動」，亦即前一假設，而其理由幾乎又是後一假設的否定。如果作者能在提出問題之後，即先說明兩種假設各有道理，亦各有反證存在，將可避免讀者一直讀到最後才恍然大悟。

其次，某些敘述文字太過簡略，例如：頁142 第 5行「其中伯4673號、伯3739號係代錄殘卷」，讀者可能不明瞭作者所謂「代錄殘卷」究竟是什麼。事實上作者在其〈讀敦煌佛典經錄札記〉一文中則說得很清楚，伯4673號 B段和伯3739號，王重民曾分別定為《歷代三寶紀》，經作者考定均係《大唐內典錄》〈歷代眾經傳譯所從錄第一〉之殘卷。【註三】然而將「歷代眾經傳譯所從錄」逕稱為「代錄」而未加說明，則令讀者頗難索解。

又如：頁130 第16行提出「當時敦煌的大藏經是否完全與他們所改制的《入藏錄》相符？」以下則逕以《入藏錄》指稱「敦煌地區依據《內典錄·入藏錄》改制而成的《入藏錄》」，此舉十分容易使人陷入迷陣。因為許多經錄本身含有《入藏錄》，因此《入藏錄》本身係一泛稱，如頁20第 7行也說：「當時大藏經尚未正式形成，經錄中亦未出現《入藏錄》這樣的目錄。」如果要將泛稱的《入藏錄》改為專稱敦煌地區經過改制的《入藏錄》，最好能加上其他足以識別的字眼。又如頁30第 4行「在敦煌地區，直到吐蕃統治時期，寺廟用作藏經管理依據的就是《內典錄》的《入藏錄》。」其實嚴格一點應該說，敦煌寺廟用作藏經管理依據的《入藏錄》，就是以《內典錄》的《入藏錄》為基礎改制而成的。

其他還有一些資料交待得不夠明白之處，最好能夠加註。例如：頁136 第5行「歷代曾出現過三種《四分律抄》……上三種《四分律抄》我國歷代經錄均未載，歷代大藏亦均未收」，既然經錄未載、大藏未收，似應註明資料出處。又如：頁210 第 2行言《都數目錄》「其中不少經在中國根本沒有被譯出過，竟也注上了唐國存數。」其中不少經究指哪些經典，似應加註說明。

四、參考書目方面

所附參考書目太過簡略，不便於讀者查考。作者雖然在附錄四中著錄了「主要參考書目」，但於叢書僅列舉叢書名稱，例如《大正藏》、《敦煌寶藏》等；但《大正藏》計有100 冊，《敦煌寶藏》也有140 冊，讀者實難據此簡目檢出作者所用的材料。至於單篇文章，作者亦僅舉出登載的期刊名稱，例如《現代佛學》、《法音》、《世界宗教研究》等，而未能一一標舉文章的作者、篇名、卷期、出版年月等詳細資料。所用專書，雖列有作者與書名，但未標示出版社的名字、出版的時間和地點，依舊不便讀者據目檢書。

五、排印、校對上的一些問題

由於本書採用簡化字排印，可能會造成讀者對某些正體字的混淆，例如：《開元錄》的作者「智昇」，便簡化成「智升」。此外，本書中「人」、「入」的印刷體不夠分明，如果讀者將「入藏錄」看成「人藏錄」，便讀不通了。又頁121 最末一行云：「請參見附錄一……及兩號的照片」，而本書實未印出照片。其他有關作者筆誤或排印的錯字也不少，試舉例如下：

凡「僧祐」之處均誤為「僧佑」，例如頁20第18行、頁21第 8行等。

頁 94 第14行「到780 年」誤為「到848年」。

頁114 第22行「斯3983號」誤為「斯3938號」。

頁115 第13行「斯3983號」誤為「伯3983號」。

頁140 第12行「戊辰年」誤為「戌辰年」。

頁154 第21行「全唐文」誤為「金唐文」。

頁156 第21行「文綱傳」誤為「文网傳」。

頁158 第20行「839 」誤為「889 」。

頁174 第20行「智顓」誤為「智槃」。

頁193 第17行「開元錄」誤為「元元錄」。

頁309 第17行「伯3010號」誤為「伯3019號」。

頁310 第 2行「伯3432號」誤為「伯 432號」。

頁321 第 3行「伯3010號」誤為「伯3919呈」。

頁324 第 7行「棄 一帙」誤為「弁 一帙」。

頁335 第 6行「法月譯」誤為「利月譯」。

以上大致是由讀者的需要這個層面，分別就本書的組織、內容、行文、參考書目和排印上的問題提出了一些小小的意見，也可以說是基於求全的心態對作者所做的苛責，這些全然無損於本書的價值。要言之，方廣錫先生此書是一本學術水平極高的著作，對於從事目錄學、敦煌學、佛教文獻學研究的學術工作者而言，都具有很高的參考價值。

【註一】 參閱小田義久〈敦煌三界寺の《見一切入藏經目錄》について〉，《龍谷大學論集》434・435合號（1989.11）。前此，塚本善隆、竺沙雅章、岡部和雄都曾有文章提到其中的寫本。

【註二】 王重民，〈記敦煌寫本的佛經〉，《敦煌吐魯番文獻研究論文集》第二輯，1983.12。

【註三】 參閱方廣錫，〈讀敦煌佛典經錄札記〉，《敦煌學輯刊》1986年第一期（總第九期）。